

论《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中的欲望书写与伦理反思

黄家骏 (Huang Jiajun)¹

摘要：美国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在其作品《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中以马丁陷入人兽恋作为核心事件，围绕人物之间的争吵作为推动戏剧发展的主要内容，揭示多元文化主义所造成的伦理混乱的社会现实，书写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危机。欲望书写是进入该文本的关键，聚焦戏剧人兽恋事件、人物之间的争吵以及马丁对儿子同性恋取向的态度，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伦理观造成了社会普遍的道德模糊，以及由此引发的乱伦、兽奸、恋童等伦理混乱。更深一层而言，戏剧角色以“政治正确”搁置解决矛盾的行动，反映出阿尔比对后现代主义伦理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欲望书写；伦理混乱；伦理反思

Title: On Desire Writing and Ethical Reflection in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Abstract: Edward Albee, an American playwright, in his work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takes Martin's fall into bestiality as the core event, and the quarrel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as the main cont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y, revealing the social reality of ethical confusion caused by multiculturalism and writing the ethical crisis prevailing in the post-modern American society. The Desire Writing is the key to entering the text. Focusing on the event of bestiality in the drama, the quarrels among characters, and Martin's attitude towards his son's homosexuality, we can see that the postmodernist ethical view has caused a general moral ambiguity i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ethical chaos that follows, such as incest, bestiality, and pedophilia. On a deeper level, the dramatic characters' us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to set aside actions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reflects Albee'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postmodernist ethics.

Keywords: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Desire Writing; Ethical Confusion; Ethical Reflection

引言

《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以下简称《山羊》)是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 1928-2016)在2002年发表的剧作，并于当年获得托尼最佳戏剧奖。该剧围绕男主人公马丁与其妻子斯蒂薇、朋友罗斯以及儿子比利之间的争吵展开，讲述了男主人公由于陷入“人兽恋”而最终导致家庭结构分崩离析的伦理悲剧。从阿尔比的创作历程上看，伦理主题一直都是阿尔比戏剧中的重中之重。对于阿尔比来说，戏剧中对出轨、乱伦、兽交、谋杀等伦理禁忌的舞台再现并不是为了简单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而设置，而是有着更加严肃的社会思考。正如《剑桥爱德华·阿尔比指南》提到：“阿尔比将他的戏剧(《山羊》)精心设置在经济繁荣的百老汇，这个剧场见证了阿尔比创作上的成就，这是一个与观众联系非常紧密的地点，他拒绝他所描绘的环

¹ 黄家骏 (Huang JiaJun)，广东白云学院中文系助教，研究方向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电邮：wxhjj2025@qq.com。

境与我们的生活保持一段舒适的距离”（Gainor, J. 2005, p.200）。阿尔比的行动意在表明，《山羊》所表现出的戏剧冲突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常常被人们所忽视。阿尔比指出：“我的（写作）目标是让人们觉醒，并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加以改变”（Bottoms, S. 2005, p.249）。

目前，国内关于《山羊》的伦理研究主要分为家庭伦理、生态伦理以及人兽伦理等方面，其中，张琳与郭继德（2009, p.39）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山羊》体现了“阿尔比在矫正当代人对待自然、对待动物问题上出现的种种偏差的同时，提醒人们保持个人‘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完整、和谐”。张定铨与周怡（2006, p.124）分析了《山羊》中欲望与性别问题的关系，并从精神分析入手指出：“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的欲望，特别是性欲，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山羊》中所表现的几种不同方式的性行为。在美国社会中，非主流的性行为——同性恋、恋童癖，等等——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这已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学者樊晓君（2020, p.113-118）则从伦理禁忌的角度出发，认为阿尔比在戏剧中以婚姻伦理、性别伦理、人兽伦理、父子伦理的四重禁忌警醒人类反思美国后现代文明社会普遍存在的伦理危机问题。此外，针对《山羊》的其它研究里也会涉及对该剧作中的伦理命题的思考和阐释。

可以看到，阿尔比笔下的戏剧冲突通常与人物的欲望有着密切的联系，康建强（2015, p.9）指出，“欲望书写是文学创作的原初驱动力与核心内容，审美是文学书写的必要手段，言语是欲望书写的个性化表述与诗性创造”，因此，阿尔比对欲望的书写不仅深化了戏剧的表现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写作动因。本文试图从欲望书写的角度出发探讨《山羊》的伦理表达，通过分析戏剧核心事件“人兽恋”这一伦理僭越的发生，揭示戏剧人物关系背后隐含的伦理隐喻，挖掘爱德华·阿尔比在戏剧中的深层伦理反思。

一、“缺乏”的焦虑：伦理僭越的发生

“人兽恋”作为对伦理禁忌的僭越，是引发戏剧矛盾冲突的核心事件，然而，其发生却是突然的、无征兆的。男主人公马丁原本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谓是工作事业有成，是过着理想的人生。但在一次郊外出行中，马丁只是“对视”一眼就恋上了山羊，并为其取名为西尔维亚，而后把它圈养起来当作自己的“情妇”。

关于为何马丁会在与山羊注视的一瞬间就迷恋上了那只山羊，学界的解释可以主要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从家庭伦理出发，认为事业的压力与家庭生活的不如意给马丁带来了情感危机，而马丁会恋上山羊的“根源在于面对自己情感危机的失控，马丁身上的‘兽性’因子失去了有效控制，他的非理性意志控制了他的理性判断”（张连桥 2016, p.135）。一类则通常从阿尔比戏剧的自然主义倾向出发，如樊晓君（2017, p. 44）认为：“马丁对自然的向往与渴望，在现实行为中表现为，试图通过与山羊的恋爱得以释放”。这两类解释可以归为马丁陷入人兽恋的客观原因，但仍未解释为何马丁忽然从一个异性恋者转变为一个兽恋症者，即马丁欲望客体与性欲结构的转移逻辑。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看，马丁之所以走向人兽恋并不是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弗洛伊德（2014 p.23）在《性学三论》中提到，“所谓正常的性目的，通常指性器的结合，它可以消除性紧张，去掉性本能，其满足类似于对饥饿的满足”，而后在讨论人对动物的特殊性癖时弗洛伊德提到，通常在正常的性目的得不到满足时，人才会做出与动物性交的饥渴行为。但是，在《山羊》中，马丁陷入人兽恋并非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在第一幕中，妻子斯蒂薇正在插花，这是为了马丁接下来要受的采访

而做准备，体现出妻子对马丁的照顾与关心，因此，此时的马丁仍与妻子保持正常的夫妻关系，可以进行正常的性生活，无需作出出格的行为。

《山羊》从三个方面展示出马丁的完满人生：其一，是作为男性的事业成就的欲望得到完满，文本提到，正值中年的马丁是行业内顶级的工程师，第一幕中朋友罗斯的到来就是为了采访他——因为他获得“普利兹克奖”这一建筑业的“诺贝尔奖”，是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得者；其二，正如上文所说，是马丁在感情与家庭中的完满，他非常满意自己的妻子，并且在剧本中多次提到他独爱自己的妻子，多年来面对其它女性的诱惑而无感，同时，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冲突爆发之前，他们的家庭处于其乐融融的状态，正如儿子比利所说：“你让我比其他孩子感觉好得多，好过许多他们的‘妈和爸’”（阿尔比 2013, p.57）；其三，是马丁在社会交际中的完满，常年以来，罗斯作为马丁最好的朋友，一直支持着马丁，出于这份信任，马丁也向罗斯坦白了他陷入人兽恋的事实。

要解释马丁为何看似完满但其欲望却仍然得不到满足，我们必须清楚欲望为何？它从何处生成？雅克·拉康（2001, p. 602）认为：“人的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换言之，人的欲望并不由自身生产，它是从他者那里获得的，而“欲望本质上是一种缺乏或不在场的欲望”（Lacan 1991, p.223）。当马丁在中年几乎实现了所有常人梦寐以求的成就后，他发现自己仍然是空虚的，这种欲望的缺乏使得马丁焦虑，马丁因而将欲望指向别处，换言之，恰恰是因为作为常人正常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才使得马丁突破人类伦理规则的限制，强迫一只山羊与自己进行性交。

在马丁的口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其由于“缺乏”的焦虑而发生欲望转移的戏剧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丁的焦虑表征为记忆力衰退、妄想以及心力交瘁等一系列症状。马丁与山羊第一次相遇时处于一片田野中，而他当时去往田野的目的是想要在郊外买一处乡间别墅。在以往自然主义或生态主义角度的论述中，马丁对乡间的向往出自于其对城市钢筋水泥的厌恶，他希望能够田野中找回自己已经丢失的自然性，这或许可以作为对马丁拥抱自然的外部解释。而马丁向往郊外生活的内部原因，在于马丁从未享受过这种生活，由于工作与社会上的名利双收，马丁的社会欲望大多都得到了满足，而马丁也因此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欲望的“缺乏”。就在这时，田园生活作为马丁与斯蒂薇的共同想象，自然而然成为马丁当时新的欲望目标。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被放置在田野中的山羊是自然的喻指，“马丁在处理 and 山羊的关系上扮演着一个“征服者”的角色”（樊晓君 2017, p.37），这种关系隐喻着普遍存在的人与动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如果从欲望与伦理的关系对此进行考察，则可以发现，马丁如此迅速地与山羊产生感情，一方面是出于戏剧效果：从“田园生活”欲望到人兽恋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引起观众的思考；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出马丁对欲望无休止的追求，作为一个主持过千亿项目的德高望重的建筑师，马丁买下一个乡间的别墅完全不是问题，那这个欲望实现过后呢？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更多的欲望。阿尔比在此将对马丁的欲望书写直接走向了极端，显示出阿尔比对欲望无限扩张而得不到节制所作出的警示与忧虑。

此外，马丁参加的治疗兽恋者的心理治疗的场所，恰恰说明了马丁刚刚产生的欲望（在此之前他从未建构过的欲望）需要完成来自他者的社会性建构。在拉康那里，“他者是一种他在性的结构力量，是能指的场域，是主体在此完成其认同的场所”（吴琼 2011 p.31），马丁在这个协会中完成了对其兽交行为的认同与建构。正如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新闻：西方某些富人开办的种种变态的性派对——如恋童癖派对、群交派对、女性拍卖会等，同理，这些派对也是富人们对自己的兽性欲望取得自我认同的场所，因为他们过于富有所以导致正常欲望太容易得到满足，因而寻求僭越禁忌的快感，

而通过将社会禁忌的内容在一个小范围内公开化，他们完成了对此不可言说之行为的符号构建。马丁在参加了协会之后也将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合理化，因此才会出现他与妻子的争辩。实际上，山羊只是马丁的欲望镜像，马丁不停地将自己的欲望强加给山羊，并予以其姓名西尔维亚，通过赋名将其私有化，而山羊本身却并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山羊被居于参照的位置，是马丁欲望的傀儡，或者以拉康的术语来说，它只是小客体 a 的暂时填补，欲望本身仍然是匮乏的。

阿尔比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主义焦虑，那么他要么是愚蠢的畜生，要么就是麻木不仁”（Bruce J. Mann 2003, p.132）。在阿尔比的戏剧中，矛盾与冲突通常是围绕人物各种意义上的焦虑而发生和进行的。通过欲望书写的角度对马丁伦理僭越的行为进行考察使得文本的视野走向人类与文明的关系本身——即主体欲望的缺乏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焦虑，影响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与伦理状况。在 80 年代的一次访谈中，阿尔比谈到对动物的看法：“我也喜欢动物，但每样东西都必须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真实的层次，一个是象征的层次。一出戏，要想有趣，必须有两层或三层或四层”（Albee, E., & Kolin, P.C. 1988, p.90）。在《山羊》中，动物的出现成为了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的隐喻：兽交作为一种伦理禁忌，对兽交的欲望处于一种永远无法完满的状态（即不被社会所承认），而恰恰因为这种特质，马丁选择了与山羊反复性交以平复自己缺乏的焦虑，这是一种通过僭越自身“超我”与社会伦理禁忌所带来的享乐，而兽交或许在文本中的象征层次在于其隐喻着所有超出人类伦理规则的欲望之物。在此，上文所概述的阿尔比的忧虑有必要重提：在这个欲望实现过后呢？

二、争吵的本质：伦理关系的隐喻

在一篇名为《阿尔比近期戏剧中的后现代张力》的论文中，作者诺玛（Jenckes, N. 2003, p.119）在对《婚姻游戏》（*Marriage Play*, 1986-1987）、《碎片》（*Fragments*, 1993）和《三个高个子女人》（*Three Tall Women*, 1991）三个戏剧文本的分析中指出“阿尔比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转化为他的情节和人物：这些戏剧是关于这种冲突的，也是关于后现代主义时期对超越自身的新时期的竞争”。可以说，《山羊》延续了阿尔比的这一思考，剧中人物之间的争吵占据了大量的篇幅，不同角色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伦理立场，隐喻着后现代主义社会发生伦理冲突与产生伦理混乱的成因。

在讨论戏剧人物的伦理立场前，有必要对上述论文所提及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简要的梳理。现代主义通常是指笛卡尔、康德以及黑格尔以来的对理性的批判，他们“将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确定性视为知识的属性，使得这种知识观具有一种‘绝对论’的色彩”（陈嘉明 2006, p.334）。而后现代主义则将现代主义对“确定性”与“普遍性”的讨论转向了对“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讨论上来，“颠覆”“去中心化”“多元化”等是它的关键词与名片。这一转变在伦理学上表现为对一切既定伦理规则合法性的怀疑，对此，齐格蒙特·鲍曼（Bauman, Z. 2002, p.24）在《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说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在此，《山羊》中的争吵戏可以视作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文学尝试。需要说明的是，戏中人物的伦理立场往往是通过人物对性别的欲望与态度所体现。

回到戏剧，争吵的根源在于马丁陷入了人兽恋这一事实，而矛盾的爆发在于罗斯寄给斯蒂薇的揭发信：罗斯是马丁多年来的好友，在得知马丁与山羊的不伦恋情后，罗斯“出于良心”选择将真

相公之于众。然而，对于异性恋结构下的道德僭越，罗斯却持着包容的态度，即使这种行为有可能导致他口中的另一位朋友斯蒂薇受到伤害——在多年前，马丁与斯蒂薇刚陷入热恋，而罗斯也已经结婚了，但他仍然约马丁一起叫了电召性服务。在罗斯心中，与其它女性出轨所犯的错误可能仅仅只是道德问题，而非伦理原则的崩塌，因此在听到马丁可能陷入一场婚外恋时，他并没有惊讶，反而在脑海中建构起一套异性恋叙事的欲望想象——“哇，一个美女！金发披肩……”（阿尔比 2013, p.23）。当罗斯得知马丁出轨的对象是一只山羊时，他感到难以置信，并且马上做出最激烈的反应——向马丁的妻子告密，以使得马丁马上遭受惩罚，这也是戏剧冲突前的前奏。不仅如此，在看到马丁与比利父子相拥时，罗斯也表示出对同性恋厌恶的情绪：“天哪！恶心！这是什么……传染病？”（阿尔比 2013, p.60）在罗斯那里，同性恋与兽奸一样是难以接受的。可以说，罗斯在戏剧中持保守派的立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斯是一个道德十分高尚的圣人，他仅仅是对一切非传统意义上的性欲结构都抱着抵触的态度。

比利在剧中提到，马丁与斯蒂薇都是民主党人，以此证实父母对自己同性恋取向的包容。在此，阿尔比强调他们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在映射他们的伦理立场。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伦理倾向，譬如在同性恋问题上，“民主党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共和党则反对同性婚姻，支持联邦和州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张业亮 2012, p.58）。区别在于，共和党的选民认为传统的家庭结构是一种天然的存在，对同性恋的法律认可会导致对这一结构的破坏；而民主党的选民则认为同性恋作为人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传统的家庭结构不存在天然的合法性。尽管马丁与斯蒂薇都是民主党人士，但他们二人之间又有一定的区别，斯蒂薇虽然支持不同的性别取向，但她自己的行动仍然是保守的，她从母亲那里接过一套夫妻完美生活的想象，并忠诚于自己一心建构起来的异性恋家庭，并将它打造成自己心中完美的状态——“（作广告状）性爱一流，厨艺一流，窗户擦得锃亮。”（阿尔比 2013, p.42）在此，阿尔比使用“广告”一词反映了斯蒂薇对这种传统家庭欲望结构的认同与想象。

与斯蒂薇的保守相比，马丁则显得更加激进。他主动承认自己“比他们（民主党）更民主党”（阿尔比 2013, p.57），这种激进立场打破了马丁追求欲望的伦理边界，导致其最终成为一名兽奸者。在马丁为自己的辩解中，他认为自己仅仅只是婚姻出轨，他与山羊西尔维亚之间拥有爱情，他直言道“我想……我们都是动物”（阿尔比 2013, p.49），在马丁的视角里，他与山羊之间的爱情理应获得理解，潜在逻辑是每个人的选择都应当获得尊重和包容。在与斯蒂薇的争吵中，斯蒂薇说道“下一个你就要操比利了”，而马丁的回应是：“他不是我要的那种”（阿尔比 2013, p.48）。这段谈话富有深意，它揭示了马丁的泛性论思想，即如果儿子比利处于自己的欲望范围以内，他可能也会选择“乱伦”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似乎父子乱伦也可以是人们应该包容理解的行为，这样一来，家庭伦理关系被完全解构了。马丁的实际行动也确实充满了这种倾向，如面对还是婴儿的儿子突然勃起、与儿子亲吻等。

此外，比利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阿尔比对此角色的设置是具有警醒意义的，他作为戏中一定程度上的旁观者实际上也映射出观众的处境。在戏剧中，比利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比利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本就会遭到一定的困扰。当然，这种模糊的立场也源自于父母伦理观念的冲突与混乱：他一方面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反感自己的父亲陷入“人兽恋”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与父亲相吻相拥，以乱伦的行动支持着马丁的立场。比利说道：“性和爱，

爱情和……（对罗斯）我差不多就是要和他睡。（悲哀地大笑）我要和所有人睡”（阿尔比 2013, p.60）。在这里，比利受到父亲马丁影响而将欲望转移到父亲身上，并妄图通过与父亲亲吻来重塑家庭伦理关系，而在面对罗斯的质疑时，比利的歇斯底里展现出他伦理观念的彷徨，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中，比利不仅迷失了自我的伦理身份，也同父亲一样有着僭越伦理禁忌的危险。

综上，马丁、斯蒂薇与罗斯三人的争吵本质上是三种不同伦理立场的交锋。保守派罗斯坚持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原则是不可僭越的；斯蒂薇作为略保守的自由派，对那些还未被完全接受的新事物（如同性恋）保持宽容的态度，但对于不可想象的伦理禁忌（如兽奸）则是坚决地制止；马丁作为激进的自由派则秉持弗洛伊德式的泛性论思想，即马丁认为现代文明提倡的性道德观“导致对生活的普遍焦虑”（弗洛伊德 2014, p.123），于是对一切能够满足享乐的事物来者不拒，解构了伦理准则的合法性。可以看到，阿尔比通过对一个家庭内所发生的争吵的书写，将当代美国身份政治问题具象化，指出了后现代主义伦理语境下因“道德模糊”而造成伦理观念的混乱。学者王建勋（2019, p.58）指出，后现代主义下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天然倾向是质疑和反对主流文化”——即通过质疑一切“本质主义”伦理/文化的合法性，反而赋予了一切伦理/文化合法性的事实，人的欲望也得以在现实中无限扩张。同时，阿尔比的写作意图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这一事实的批判，通过文学性叙述，阿尔比继续描绘出了这一思潮可能导致的乱伦、兽奸、恋童等伦理混乱图式，展现了在后现代思潮的发展下普遍存在的社会伦理危机。

三、激进的保守：伦理反思的呈现

一直以来，阿尔比都被看作是一个道德保守的戏剧家，因为阿尔比非常注重作品的伦理教诲作用，他的戏剧看起来总是讲述人因欲望而走向堕落的故事，进而给予人们道德上的警示，比如在改编剧《欲望花园》（*Everything in the Garden*, 1967）中，阿尔比批判了理查德夫妇在拜金主义下的欲望膨胀，揭露了人被金钱异化的事实；阿尔比另一个戏剧《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 1960）与前者异曲同工；《三臂人》则以主人公“他自己”（himself）长出第三只手臂后开始无节制的追求，显示出消费社会的腐朽等等。在这个角度上看，《山羊》似乎也是一出劝人勿过界的道德戏剧，让我们返回传统家庭伦理，以避免伦理冲突的发生。但下文将探讨的《山羊》中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细节：马丁对儿子同性恋取向的态度转变，将进一步表明阿尔比的戏剧并非只是简单的道德剧，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伦理层面的反思。道德与伦理的区别在于，道德只区分善恶，“伦理是对道德的抽象化和理论化，它从集体与社会立场以及从理性的层面总结解释和说明道德”（聂珍钊 2014, p.254），道德层面的反思是保守的，是劝人遵循当下的社会规范，而伦理层面的反思则是激进的，它意图改变社会对当前规范的看法。在此，《山羊》的目的并非简单地告知人们勿僭越禁忌，而是激进地从集体和社会的角度进行伦理反思。

在阿尔比笔下，马丁在情绪激动中对儿子比利“同性恋倾向”的谩骂与尖酸刻薄的讽刺表明，一个看似包容的多元社会实际上可能只是存在于表面的和谐。如前文所述，马丁自称比民主党人更“民主党”，象征着一种包容开放的伦理态度，在“山羊”事件东窗事发之前，马丁在面对儿子比利的同性恋倾向一直处于包容的态度，这从比利对马丁的自述中可以看出：“我同两位最优秀的人一起生活。如果我出生在别的家庭里，也不会比这好……你的观念培养一个孩子并不要求他完全像你，你始终让我感到你对我成为同性恋的宽容要远远超过你的内心”（阿尔比 2013, p.57）。然而，一旦冲

突爆发，这种表面的和谐便立刻消失了：

比利：（嘲讽地笑）你他妈的在操一只山羊还让我别骂？！

马丁：你知道你自己的性生活…

斯蒂薇：（还在窗口；冷冷地）好了，你们两个！

比利：（对马丁）至少我的对象是……人！

斯蒂薇：（走进客厅）我说过了，好了，你们两个！（阿尔比 2013, p.26）

在比利得知父亲马丁成为兽奸者后，他开始对父亲的行为展开谩骂，实际上，比利的愤怒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当时的伦理语境下，“人兽恋”是违反社会伦理常识的行为，当父亲既出轨又与兽奸相联系时，作为儿子这一伦理身份的比利情绪失控说粗口就能够解释得通。然而，身为父亲的马丁却在儿子的骂声中不堪受辱，以儿子的同性恋选择作为回击，这就无法解释了，因为在此之前马丁一直支持儿子比利的选择。虽然马丁马上为此道歉了，他暗示自己是因为情绪激动才会言语中伤比利，但在后面的对话中，马丁继续讽刺儿子可以去“公共便池”或“死亡夜总会”待着（阿尔比 2013, p.30），而这些场所属于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体现出马丁对儿子比利同性恋的歧视态度。这表明，尽管马丁在和睦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儿子同性恋倾向的包容，然而，情急之下马丁的反击却无意间透露出其真实想法，即他并没有真正尊重比利的性取向，马丁作为民主党人，可能只是出于美国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宽容氛围而选择在表面上保持平和，这归根结底是美国社会“政治正确”运作的结果。

“政治正确”意指“在涉及不同种族、民族、性别和其他群体差异和利益纷争的时候，应该同情和扶持弱势群体，以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张军 2014, p.196）。60年代，美国在法国五月风暴余波的影响下进一步深化了本土的反文化运动，这深刻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性解放、吸毒、摇滚乐、嬉皮文化等一时间在社会风靡。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就受到法国“五月风暴”运动以及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影响，“把批判的锋芒由经济基础转向了文化领域，其结果之一便是催生了文化多元主义”（张军 2014, p.194），而文化多元主义正是美国“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但是在今天，这些曾经的革命思潮很容易被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所挪用，正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指出：“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留给今天的是很容易就能被整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的享乐主义。”（引自连小丽、王小会 2004, p.70）。阿尔比受美国传统新教伦理的影响，对后现代主义所表现的不受节制的欲望倾向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也对“反文化运动”中过度激进的各种“解放”表示质疑，通过父子对骂中马丁对儿子比利同性恋的歧视言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对儿子的不理解由来已久，但却因为“政治正确”被长期搁置，没有得到交流和解决，相反，在“政治正确”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马丁一味地在表面摆出认同的姿态，在与罗斯交流比利的同性恋问题时可以清晰地看到马丁在内心深处并不理解也不认同比利的选择：

马丁：你指“一旦遇到合适女孩后你会喜欢”这类说教？没有，我和比利都太清楚了。我问他是否认准。他说他肯定是；他说他喜欢那样。

罗斯：那是，他当然喜欢。他终究会追女人的，天哪！别担心他。

马丁：谁啊？

罗斯：比利！十七岁嘛，这是个过程。

马丁：像月亮的周期，对吗？

罗斯：用句双关语——他会理顺的。（安慰）比利会摆脱的，他会恢复正常。

马丁：（勉强肯定）希望如此。（阿尔比 2013, pp.12-1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丁其实仍然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异性恋，他认同了罗斯的话，但却用一种“勉强肯定”的姿态，因为在“政治正确”这一主流思想面前，作为民主党人的马丁对这种性别话题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敢轻易和儿子比利讨论相关的话题，矛盾因此被掩盖起来，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矛盾就会爆发，可以看出，身份政治外壳下的包容有可能导致更深层的隔阂。

伊格尔顿（Eagleton, T. 2000, p.28）指出，后现代主义是 60 年代一系列解放运动“政治失败的结果”，是左派激进运动在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后现代主义中“不同的文化是完全自我证实的和相互之间不可比较的”（Eagleton, T. 2000, p.141），文化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与排他性，使得不同文化的交流正逐渐流于形式上的认同，边缘群体内在的价值观没有得到大众的了解并接受，却为许多僭越伦理禁忌的文化如乱伦、恋童癖、兽奸等提供了理论保护，真正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相互理解反而没有实现。在前文所述马丁为自己兽奸行为的辩解中，可以看到马丁使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潜在逻辑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阿尔比在此暗示了后现代主义伦理观可能被用于消解道德合法性的危险，但阿尔比的思考并没有局限于此，他专门设置了一个同性恋儿子的角色，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通过马丁对比利态度的变化，揭示了马丁与比利之间一直以来尚未解决的隐藏矛盾，在这段情节中，阿尔比敏锐地察觉到了后现代主义无力解决社会伦理矛盾，甚至因此搁置了解决矛盾的行动的现实困境，揭示了后现代主义伦理悖论性的一面。

有研究者（Craig, L. & Albee, E. 1992, p.52）评价道：“仔细观察，在今天最刻薄的戏剧家往往被证明是最道德的。阿尔比谴责年轻一代不是因为他们大肆宣扬的‘罪孽’，而是因为他们拒绝理解传统的有效性，而过去的传统是如此勇敢地将混乱转化为秩序”。这段 90 年代对阿尔比的评价恰好体现了《山羊》的主题，也昭示了阿尔比看似道德保守书写下的真实意图。阿尔比并没有被文化多元主义看似解放的话语所迷惑，他在戏剧情节中剖析了后现代主义中多元文化主义倾向暗藏的危险与不稳定因素，指出后现代主义激进的外表下其行动却是悬置的，因此，在普遍提倡解构一切的今天看来，阿尔比在《山羊》中所体现的保守姿态——恢复传统家庭结构——反而是一次激进的行动。

结语

概言之，《山羊》讲述的是一个当代社会正在时刻上演的悲剧。爱德华·阿尔比有意将马丁的欲望引向当代人无法接受的极端——人兽恋，并让戏剧中的四位角色用争吵来展现出情节背后那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其中，在对待比利同性恋的书写里，阿尔比揭示了后现代主义中“身份政治”存在的弊端。首先，爱德华·阿尔比在《山羊》中对“人兽恋”的书写并非只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而是以一种极端欲望追求的展示将观众引向剧场反思的空间，意在对 21 世纪初美国的伦理思潮与伦理现状作出批判与反思，告诫人们对欲望的追求要适可而止，否则将会走向深渊，在此，

“山羊”是所有冲破限制的禁忌行为的隐喻，而对这种伦理僭越的欲望书写一直是阿尔比创作的关注点。再之，阿尔比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对道德合法性的解构，他认为“所有的文明对其宽容度都有着专断的限制”（阿尔比 2013, p.65），否则就会出现像《山羊》中马丁一家的伦理悲剧。聂珍钊教授指出了当前一些文学作品所走进的误区：“在现在的一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里，人的本能和人性被混淆了，人的本能往往被当成人性加以颂扬和肯定，由于人的本能被当成了人性，因此人的本能或被肯定，或被歌颂。显然这是一种需要注意的倾向”（聂珍钊 2010, p.19）。可以看到，阿尔比非常注重戏剧的伦理教诲作用，在《山羊》中以严肃的态度处理人性与欲望的关系。最后，在《山羊》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即马丁对儿子比利同性恋取向的态度转变，它体现出阿尔比更深一层的伦理反思，表明了“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在当代社会看似解放与革命意识和运动实际上是保守的，因为它搁置了交流与改变的行动。在《山羊》里，阿尔比没有直接提出任何确切的解决方案，仅仅提供了一个定格的悲剧画面，使观众陷入沉思。但回顾阿尔比的创作，可以看出，阿尔比认为“与他者的关系”是个人作出伦理选择时首要考虑的，无论是《动物园的故事》抑或是《美国梦》等作品都提出了关于当代社会中人际藩篱的思考，这种对主体间性的重视可以看作阿尔比对当前伦理困境的一种解决路径。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戏剧中的悖论诗学研究”（编号：21YJC752024）系列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爱德华·阿尔比(2013):《山羊:阿尔比戏剧集》，胡开奇译。新星出版社。

[Albee, E. (2013).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translated by Hu Kaiqi. New Star Press.]

Albee, E. & Kolin, P.C. (1988).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Albe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Bottoms, Stephen (Ed.) (200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ward Albe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aig, L. & Albee, E. (1992). "Edward Albee." *BOMB* (38): 52-55.

陈嘉明(2006):《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Chen, J. M. (2006). *Fifteen Lectures on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樊晓君(2017):“禁忌与替罪羊:阿尔比戏剧《山羊》的荒诞性阐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3): 43-47。

[Fan, X. J. (2017). "Taboo and Scapegoat: The Absurd Interpretation of Albee's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3): 43-47.]

樊晓君(2020):“严肃与戏谑:阿尔比戏剧《山羊》的伦理禁忌叙事批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5): 113-118。

[Fan, X. J. (2020). "Seriousness and Irony: Ethical Taboo Narrative Criticism in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113-118.]

Gainor J. (200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ward Albee*. In Bottoms, S. (E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6.

Jenckes, N. (2003). *Edward Albee: A Casebook*. In Bruce J. Mann (Ed.). Routledge: 109-120.

Lacan (1991).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 translated by Sylvana Tomaselli. Norton.

雅克·拉康(2001):《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三联书店。

[Lacan, J. (2001). *Ecrits*, translated by X. Q. Chu.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康建强(2015):“文学、欲望书写与审美”,《甘肃社会科学》(05): 6-9。

[Kang, J. Q. (2015). “Literature, Writing Desire, and Aesthetics”. *Gansu Social Sciences* (05):6-9.]

连小丽、王小会(2009):“齐泽克论 1968 年 ‘五月风暴’”,《国外理论动态》(04): 70-72。

[Lian, X. L., & Wang, X. H. (2009). “Zizek on the ‘May Storm’ in 1968”. *Foreign Theoretical Dynamics* (04): 70-72.]

Bruce J.Mann (Ed.) (2003). *Edward Albee: A Casebook*(pp.131-142). New York: Routledge.

聂珍钊(2010):“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01): 12-22。

[Nie, Z. Z. (2010).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1): 12-22.]

聂珍钊(2014):《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Nie, Z. Z. (2014).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齐格蒙特·鲍曼(2002):《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Bauman, Z. (2002). *Postmodern Ethics*, translated by C. G. Zha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王建勋(2019):“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当代美国评论》(02): 48-67+123。

[Wang, J. X. (2019). “Identity Politics,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American Order”.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 (2), 48-67, 12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14):《弗洛伊德文集 05——爱情心理学(车文博主编)》。九州出版社。

[Freud, S. (2014). *Freud's Collected Works 05: Psychology of Love*. In W. B. Che (Ed.).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特里·伊格尔顿(2000):《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

[Eagleton, T. (2000). *The Illusion of Postmodernism*, translated by M. Hua. The Commercial Press.]

吴琼(2011):《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Wu, Q. (2011). Jacques Lacan: *Reading Your Symptoms (Part I)*.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张定铨、周怡(2006):“马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读阿尔比的新作《山羊》”,《英美文学研究论丛》(00): 119-127。

[Zhang, D. Q., & Zhou, Y. (2006). “What's Wrong with Martin? ——Read Albee's New Book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The Collec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tudies* (00): 119-127.]

张军(2014):“‘政治正确’与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江海学刊》(05): 193-198+239。

[Zhang, J. (2014).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merican Cultural Marxism”.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05): 193-198, 239.]

张连桥(2016):《身份困惑与伦理选择——爱德华·阿尔比戏剧研究》。科学出版社。

[Zhang, L. Q. (2016). *Identity Confusion and Ethical Choices--A Study on Edward Albee's Drama*. Science Press.]

张琳、郭继德(2009):“从《海景》和《山羊》看爱德华·阿尔比的生态伦理观”,《外国文学研究》(01): 32-39。

[Zhang, L., & Guo, J. D. (2009). “Edward Albee's Ideas of Ecological Ethics in *Seascape* and *The Goa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1): 32-39.]

张业亮(2012):“同性婚姻问题与美国政治”,《美国研究》(02): 43-65+3-4。

[Zhang, Y. L. (2012). “The Issue of Same-sex Marriage and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Studies* (02): 43-65+3-4.]